

中世纪英国“君王镜鉴”中的明君理念： 言说、演变与实践

朱文旭

摘要 在君主制盛行的中世纪西欧，“君王镜鉴”对明君形象的想象与建构持续演进。12至13世纪，基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不同版本，“君王镜鉴”的三大母本塑造了三种明君形象。13世纪后，“君王镜鉴”母本在西欧多国被转译和再创作，明君理念随之传播。其中，中世纪英国的“君王镜鉴”演变脉络清晰、种类多样，较为系统完善地接受并改写明君理念。中世纪晚期英国的“君王镜鉴”作者，在剧烈的政治鼎革中推动明君理念从德性明君走向基于政治实用主义塑造的强力之君。这既是中世纪晚期英国政治理念与政治实践缠绕交织、务实去华的产物，也是“君王镜鉴”承载的政治思想在中世纪演进的重要一环。

关键词 “君王镜鉴”；“明君”；君主类型；中世纪晚期

中图分类号 K5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6)04-0068-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4CSS009)

中世纪，西欧君主制长期稳固，君主自身却存在不确定性，二者之间张力十足。君主制合法、正确且无须质疑，而君主不仅无法回避自然身体的生老病死，还要习得统治技能、提升道德修养。充满不确定性的君主因此成为决定统治秩序、治理成败的关键。这种矛盾催生直接进献给君主、储君等统治者的“君王镜鉴”^{[1][2]}(P160-196, 473-542)。其作者或受先贤启发或为现实政治异动触及，接受恩主赞助以畅想和建构理想君主，即明君^[2](P47-53, 74-107)^[3]。从“君王镜鉴”三大母本^②到它们在中世纪西欧诸国衍生作品，此类文本均将明君及其培育作为重要议题阐述。其中，中世纪英国流传的“君王镜鉴”演变脉络清晰、种类多样；不仅包括母本之一的《论政府原理》，也有诸多译本和原创性“君王镜鉴”涌现，尤其在中世纪晚期与现实政治实践高度互动^[4](P297-308)。这是系统剖析“君王镜鉴”中明君理念内核及其演进的理想切入点。

英语语言文学和历史学界曾对中世纪英国“君王镜鉴”及其蕴含的明君理念予以关注。前者较早地发掘、编撰大量以手稿形式存在的“君王镜鉴”文本。托马斯·霍克利夫、约翰·利德盖特和乔治·阿什比等人的作品，均由“早期英语文本协会”^③在19世纪末开始编撰^{[5][6][7]}。他们的研究略有侧重：考察物质性，即此类手稿的装帧、书写与收藏；注重文化性，即其韵律、韵脚、形制与表达^{[4][8]}(P136-191)。历史学

① 理想君主(ideal ruler, bon chef)，也有学者称之为“完美君主”(perfect princes)或“良主”(good rulers)。无论其名如何，一般均为符合期待的君主。

②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论政府原理》、伪亚里士多德《神秘的秘密》和罗马的吉斯《论君主政治》是中世纪“君王镜鉴”三大母本。它们代表着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在西欧再传之前、经阿拉伯世界调适后和通过原典再发现后的“君王镜鉴”，以其为基础转译和再创作的“君王镜鉴”遍及西欧多国、影响广泛深远。

③ 1864年，由弗雷德里克·詹姆斯·弗尼瓦尔牵头，英国语言学会数位学者参与，成立“早期英语文本协会”，致力于接续语言学会在编撰《新英语辞典》时曾短暂停印过、受资金限制停下来的早期英语手稿出版工作。该协会和乔叟学会一起奠定并传播当今我们所知的、几乎所有的中古英语经典。

者对西欧“君王镜鉴”进行界定和汇总^[1](PIX-XIX),并对古典或文艺复兴时期的明君理念予以初步考察^[9]。然而,明君理念并不是简单地从古代时期到文艺复兴的飞跃,其演变脉络显著,深刻作用于中世纪政治思想、政治博弈,现有研究较少系统梳理比较“君王镜鉴”母本在中世纪如何被改编并运用于实践。此外,对中世纪英国“君王镜鉴”的研究,多考察“戒律与政治实践”、作者群体,及其与英格兰政治和法律的相互作用;或针对单一作者和作品等,少见对明君理念的专题讨论^[10](P15)^[11]。

鉴于此,本文拟选取12-15世纪英国“君王镜鉴”作者笔下的明君理念进行比照,首先明晰母本建构的明君形象及其实现,其次梳理母本的流传,凸显后世作品对母本的继承、检讨和突破,复次指出这种演变的内蕴所在,最后将之置于中世纪晚期英国政治实践中进行审视,即明演变脉络、知得失限度。

一、“君王镜鉴”母本中的三类明君

《论政府原理》《神秘的秘密》和《论君主政治》声名显赫,不仅被中世纪西欧诸多君王权贵收藏,嘱托专人转译,也是众多“君王镜鉴”作家进献作品或面对赞助人相关需求时的重要参照。作为“《圣经》之外流传最为广泛的文本”^[12](P20-21),三大母本对明君形象及其实现皆有论述,但不尽相同。

被誉为“拉丁中世纪第一部政治理论著作”的《论政府原理》,成书于1159年,塑造了明君和暴君两种对立的君主形象^[13]。“元首”是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对明君的核心定义,分为君主个人与统治策略两方面。就个人而言,约翰将知识和德性视作君主最重要的特质。其中,“知识先于美德的培养,没有人能忠实地追求他所不知道的东西;而除非知晓邪恶,否则无法有效地防范”^[13](P15)。因此,“君主们必须精通文字,每天研读神圣律法的文本……正所谓‘不识字的国王就像一头戴王冠的驴子’”。约翰还指出“如果一位君主因德行卓著而受赐,恰好不识字,那他须听取识字之人忠告,以确保其事务顺利进行”^[13](P44)。此外,虔诚^[13](P46-47)、正义^[13](P30-31)、适度与四枢德^[13](P62)被约翰视作君主最应秉持的品德。美德的本质在于适度,于不足与过度之间择取中庸^[13](P29)。

通过对君主与上帝、律法、廷臣和民众等关系的处理,约翰褒贬君主统治的不同侧面,凸显明君与暴君之别。首先,作为“上帝的使者”和神圣律法的仆人,君主应“勤勉地指导和管理自己的王国”^[13](P66),并以神圣律法约束自己、施行正义。明君“遵从法律,为民众服务的意志统治;在法律的指导下,以有利于维护其显赫地位的方式施行奖惩,总能率先关注整个社会的负担”^[13](P28)。作为对比,罔顾法律、谋取私利者则是暴君^[13](PXXIV-XXVI,28-29,201-218)。其次,作为“政治有机体”的“头颅”,君主须敦促其他部门各司其职。对约翰来说,国家的问题就是统治者的问题。“因统治者的疏忽或掩盖,使政府官员的德行或声誉丧失,如同疾病侵袭身体;当身体的各个器官衰弱不堪时,君主自然无法长期安然无恙”^[13](P63)。最后,统治的艺术在于切实运用上帝赋予的权力。约翰借约伯之口讲道,“一切值得称赞的美德都在于行动,没有扎实工作支撑的华丽言辞是空洞的”^[13](P72)。由此,从个人与统治两个维度出发,《论政府原理》塑造出践行中庸之道的德性明君。

1230年,的黎波里的菲利普陪同的黎波里主教盖伊·德·维尔前往安条克考察,寻获一份完整的《神秘的秘密》阿拉伯语手稿。这本“最珍贵的哲学明珠”在以残篇的形式流传近百年后,完整地传入中世纪西欧^[14](P7)。该书相传为“最博学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应其学生亚历山大之请而作……亚历山大遵循良言与嘱托,征服许多著名的城市和国家,建立至高无上的统治”^[15](P176-177),《神秘的秘密》自然地述及明君形象及其实现。

① 勇气、正义、审慎和节制是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在《论政府原理》中提及的四种枢德。他还论及枢德的对立面,“欺骗蕴含着胆怯所代表的软弱,与勇气背道而驰;审慎遏制着暴虐,重复着‘尘土何以傲视尘土’;节制不容伤害,拒绝让别人遭受它自己不愿承受的伤害;正义排斥不正义,始终推己及人”。枢德作为荣誉之源泉分流出来的主干,从自身孕育出一切善的溪流。

伪亚里士多德^①聚焦君臣之道塑造颇具异教色彩的理想君主。首先,臣民的力量与其端正的品行是支持王国的两大力量,它们兼具削弱甚至毁灭王国的能力,国王需慎重对待^[15](P40-41)。其次,君主当秉持中庸之道、节制欲望,成为臣民的榜样。伪亚里士多德根据统治者的慷慨和吝啬程度,对国王进行区分。那些“对自己慷慨而对臣民贪婪的国王最坏,应当受到谴责,他的王国将很快被摧毁”;作者因此建议国王选取中庸之道,“当品质严重偏离中庸时,应受严厉的谴责,因为遵守慷慨很难,贪婪挥霍很易”^[15](P43)。欲望及其引发的纵欲、贪婪、吝啬、背信弃义应受到谴责,因为它会引发纷争,摧毁信仰和王国^[15](P46-47)。此外,国王须遵守神的诫命、减少公开露面,在必须公开露面时应衣着华丽而独特,最大限度地赢得臣民对他的尊重^[15](P45-54)。最后,伪亚里士多德着重介绍医学、占星学、相面术、神秘学等知识,并强调它们对于君王的意义。阿拉伯语版《神秘的秘密》在第2卷开始“为占星学辩护”,探讨身体的四个部分(头、胸、腹、生殖器),介绍相面术;在第10卷专论神秘学,揭示护身符、炼金术、宝石和草药名录等内容。上述神秘的知识将协助君主通过占星了解命运、通过相面识别臣民、通过养生学维持健康,制作护身符以令民众服从和敌人恐惧^[14](P10-16)^[16](PXII-XIV)。这些主张被完整地引入西欧^[16](PXVI),伪亚里士多德推崇的异教君主形象也随之引入。

1277-1281年间,罗马的吉尔斯用拉丁语写作《论君主政治》献给时为王子的“美男子腓力”,并在法王腓力三世的委托下交由列日圣马丁修道院院长亨利·德·戈奇于1282年将其译作法语^[12](P9-10)。作为亚里士多德再发现后的“君王镜鉴”,《论君主政治》从国王对自身、内府与王国的管理三个层次论述君主统治,凸显明君^②。他欲借此书告诉“君王当如何行事、指挥和统治臣民”,并将教导延伸至民众以“教导他们知晓如何服从”^[17](P7)。

涉及国王自身,罗马的吉尔斯关注四个问题:作为国王的终极目标、国王应具备的美德、国王应追求的激情、国王应遵循的礼仪。首先,国王须明确为君的终极目标。“国王应同时拥有政治的生活和沉思的生活,通过政治的生活来统治臣民,通过沉思的生活,充盈内心的奉献和对上帝的爱”^[17](P12-13)。其次,“君主最适合拥有所有美德,若缺失则无法完美地拥有任何一种美德”^[17](P103-106)。罗马的吉尔斯将美德区分为思辨美德、道德美德和介于两者之间的智性实践;他主张国王应拥有刚毅、节制、爱荣誉、宽宏大量、慷慨、宏伟、温和、真诚、和蔼可亲 and 友善十种道德美德,并且谨慎、正义^[17](P37,40)。运用美德也应注意,“最恰当的做法是谨慎行事,并在自己的王国里施行公正和正义”,适度节制和慷慨,秉持坚毅、宽宏大量、谦逊和友善^[17](P49-51,57-62,83-85)。复次,君王应调节自己的激情,既不过分、亦不匮乏,并且符合理性。他指出,爱、恨、欲求等12种情感^③因用途区分好坏;适度的情感为善,过度或不足的情感为恶。他强调“统治者应该仁慈和慈悲,公平地惩恶扬善……妥当处理那些可善可恶的激情”^[17](P136-138)。最后,君王应遵守礼仪避免恶行,成为他人生活的楷模和榜样。罗马的吉尔斯将礼仪按照年龄、社会地位和财富进行区分,各类群体皆有其良善的礼仪和邪恶的行为^④。他指出“君王拥有足够的

① 伪亚里士多德是在1500年前那些将自己的著作归于或被他人将其著作归于亚里士多德名下的作者们的统称。本文涉及的伪亚里士多德专指《神秘的秘密》的作者。在《神秘的秘密》传入西欧后不久,大阿尔伯特将此书归为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托马斯·阿奎那、罗马的吉尔斯不支持这种观点。1300年,《神秘的秘密》的法语版译者杰弗里指出,该书由阿拉伯语文本和希腊语文本拼接。到文艺复兴时期,《神秘的秘密》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著的事实得到广泛接受。据学者推测,《神秘的秘密》是希腊化至逍遥学派活跃时期的知识汇编,作者已不可考,因隶属于亚里士多德伪经系列,故称作者伪亚里士多德。

② 《论君主政治》各部分依次对应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其逻辑在于“按照自然顺序,国王必须首先管理自己,随后管理内府,最后才是管理城市与国家”。这其中卷一共65节论国王管理自身,涵盖引言13节、美德34节、激情11节、礼仪7节;卷二65节论国王管理内府,涵盖婚姻相关问题24节、子女21节、内府资产和仆从20节;卷三79节论国王治理王国,涵盖城市治理与哲学家观点20节、和平时期36节、战争时期23节^[12](P11-13)^[17]。

③ 这12种情感为爱、恨、欲求、厌恶、悲伤、喜悦、希望、绝望、恐惧、勇敢、愤怒与温和^[17](P134-138)。

④ 例如,儿童的六种善行是慷慨大方、勇敢、宽宏大量、善意、仁慈、谦逊;六种不当行为是情绪化、反复无常、轻信、吵闹、说谎、无节制。老年人的六种不当行为是轻信或固执、多疑、怯弱、吝啬、沮丧、无耻;四种善行是快乐、节制、温和、仁慈。中年人则介于两者之间。贵族的四种良好举止是宽宏大量(胸怀宽广,精神慷慨)、伟大(高尚,言行得当)、聪慧善学(博学多才,技艺纯熟)、具有政治头脑(谨慎明智,善于交谈);二种恶性是过度渴望荣誉、蔑视自己的先祖。富人的五种恶行是骄傲、心怀恶意、放纵、自负且自傲、僭越;富人只有一种善行,即妥帖地侍奉上帝^[17](P139-154)。

财富、贵族身份和权力，因此他应该接受教育并保持克制……其他人在礼仪中值得称道的地方，在君主身上体现得更加完整和完美”^[17](P154-157)。由此，在系统吸收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基础上，《论君主政治》塑造了基督教化的亚里士多德式理想君主。

综上所述，中世纪英国孕育最早的“君王镜鉴”母本、《论政府原理》中的明君理念和其他母本既有共通之处，也有区别。随着它们在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被传抄、改写和再创作，明君理念也在其中交融和变化。

二、“君王镜鉴”母本在中世纪英国的传播

13世纪后，“君王镜鉴”三大母本在英国及西欧诸国被持续地复制、转译，文本得到广泛传播的同时，不同的明君理念也被接受或改写。三大母本广为流传的原因不尽相同，或由友人、同侪收藏传颂，或作为修道院和大学教育材料而复制讨论，或借助作者和书籍的名声被转译进献。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论政府原理》成书后，在英格兰、法国和意大利等地得到广泛传播。该书最初献给三人，分别是坎特伯雷副院长威廉·布里托、巴特尔修道院院长奥多和托马斯·贝克特，《论政府原理》在约翰的友人和英格兰教士群体中流传开来。诸如布卢瓦的彼得、奈尔杰·朗尚等12世纪末的传抄者，“他们的兴趣集中在教士在教会和世界中的作用”^[18](P387)，较少关注该书对王权的讨论。

作为对比，威尔士的杰拉德及其后的作者更关注《论政府原理》关于王权政治的论述。在1217年成书的《治者指南》中，威尔士的杰拉德吸收《论政府原理》的“政治有机体”隐喻、暴君理论，以及国王与法律关系的讨论，他坚称君主有必要以罗马法为模板制定法律并使其得到执行，还沿用“不识字的国王就像一头戴王冠的驴子”的说法^[19](P37, 118-135, 188-197)。成书于1265-1275年间的《论暴君和君主》作为同情1258年贵族改革运动的作品，高度参照《论政府原理》。该书第一部分“论暴君和君主”来自《论政府原理》第8卷17章，第二部分“暴君是上帝的仆人”借鉴第8卷18章，对暴政和罗马帝国命运的思考摘自《论政府原理》第2、3卷等^[18](P392-393)。威尔士的约翰《简述古代哲学家与君主美德》成书于13世纪末，多直接引用、缩写或意译《论政府原理》^[20](P126)。14、15世纪，《论政府原理》在英国还影响威廉·伍斯特的《贵族之书》《君主政治》等“君王镜鉴”的写作与进献^[1](P126)^[21]。

1159年，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将《论政府原理》的一份副本送给法国本笃会修士塞勒的彼得，开启该书在欧洲大陆的传播。1211-1223年，弗洛德蒙特的赫林南德《编年史》汇编当下的知识以用作学习和教育，其中大量借鉴《论政府原理》的内容^[22](P289-302)。1244年，道明会修士文森特在《历史之镜》中，重复援引《编年史》中引用《论政府原理》片段。1259年，图尔奈的吉贝尔《君王的学问》将其论述基于《论政府原理》第5章第3节“国王获得救赎所必需的四件事：敬畏上帝、勤勉自律、对权力和官员的适当约束、对臣民的爱戴和保护”展开^[23](P6)。罗马的吉尔斯《论君主政治》则吸收使用《论政府原理》中“政治有机体”的隐喻^[17](P57-60)。

伪亚里士多德《神秘的秘密》、罗马的吉尔斯《论君主政治》在中世纪的欧洲，尤其是英国，也得到广泛传播。

在全本《神秘的秘密》进入西欧后，罗马教廷、神圣罗马帝国宫廷学者成为该书第一批读者；该书从罗马和巴勒莫向西北传播，穿过意大利半岛后到达西班牙、法国、英格兰、荷兰^①。13世纪中叶，大阿尔伯特、罗杰·培根在他们的作品中大量引用《神秘的秘密》；前者将帮助把该书从巴黎传播到科隆，后者为的黎波里的菲利普的译本作序并笺注^[16](PXV-XXXII)。图尔奈的吉贝尔在1259年完成的《君王的学问》也多次引用《神秘的秘密》^[15](P45-47, 59-70)^[23](P57-58)。此外，拉丁文版《神秘的秘密》还通过大学系统

① 的黎波里的菲利普的译本手稿，最早可以溯至罗马教宗的代理人阿尔伯特·贝海姆的个人笔记，现藏慕尼黑图书馆，编号为Munich,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Clm. 2574b^[14](P111-141)。

广泛传播。在罗杰·培根制作译本时,仅巴黎、牛津两地有十余部《神秘的秘密》手稿。1304年,《神秘的秘密》进入巴黎大学等四所学院起草的“认证文本”系统^①清单。书商桑斯的安德森将其分成八部分、以六银便士的价格出租;由于“书商通常只保留具有持续需求、周转较快的书籍”,《神秘的秘密》得以广泛地传播开来^[24](P107)。

《神秘的秘密》在中世纪英国有众多译本,并衍生多部新作。1327年,在爱德华三世加冕之际,沃尔特·米莱梅特献上自己译制的《神秘的秘密》和《论高贵、智慧和谨慎》。米莱梅特将全本《神秘的秘密》中神秘学、相面术、技术哲学的内容删去,增加“国王应当迎娶的女人”等章节^[2](P387-388)。1332年,帕古拉的威廉汇编《爱德华三世镜鉴》,提醒英王注意安抚穷人的不满情绪,其中关于国王如何处理财富的观点深受《神秘的秘密》影响^[15](P47-48)^[25](P51-69)。1379年,约翰·威克里夫完成《论君主的职责》,关于君主言行、顾问选取等问题直接参照伪亚里士多德^[15](P47-57,141-142)。此外,还有多部英译本以及衍生作品在中世纪晚期涌现。例如,约翰·索普在1391年向理查二世献上《关于国王的四种形式》,该书的第2至4章出自缩略版《神秘的秘密》^[1](P24-39)。1422年,詹姆斯·杨格向他的赞助人、爱尔兰总督詹姆斯·巴特勒献上由法语版《神秘的秘密》译作英文节律的《王子的治理》^[26](P121-248)。1449年,约翰·利德盖特留下未完成的《古老哲学家的秘密》,后由本尼迪克特·伯格继续编纂、亨利六世赞助,最终完成英文长诗版《神秘的秘密》。

《论君主政治》成书后不久便以拉丁语、各地方言开始传播^②。其路径可分为大学教育与修道生活、世俗赞助与进献两种。1304年,《论君主政治》进入巴黎大学等4所学院的“认证文本”系统,分成43份、以32银便士的价格出租;作为巴黎、图卢兹地区文科课程教科书的《论君主政治》得以迅速传播^[24](P111)。在中世纪后期的英格兰,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修道院图书馆通过购买、传抄和接受遗赠而成为传播《论君主政治》的重要机构^③。1313年,时任伦敦主教的拉夫·鲍多克将其持有的《论君主政治》副本遗赠给他所在的教堂,这是该书传入英格兰现存最早的记录。另一种路径是专业人士进献或是恩主赞助。1400年,特拉维萨的约翰在伯克利勋爵的赞助下,将《论君主政治》译作英文,并献上《贤良君主须警惕的三点》^[1](P174-271)。1410-1411年间,托马斯·霍克利夫向时为威尔士亲王的亨利五世献上《君主的统治》,该书虽不是《论君主政治》译本,但高度参照后者以及《圣经》和《神秘的秘密》^[1](P41)。同时,霍克利夫还在该书中规劝读者阅读罗马的吉尔斯辨析统治的作品^[7](P77-78)。15世纪30年代后期,主要基于《论君主政治》和《上帝之城》的《献给国王亨利六世的统治之道》成书,这份装帧精美、附有亨利六世画像的手稿被进献。

综上,“君王镜鉴”的三大母本在中世纪英国乃至欧洲被广泛地传抄、复制和转译,促使“君王镜鉴”成为中世纪西欧各地区共有的一类文本。三大母本在英国的传播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传抄齐全。三大母本均在英国有着广泛传播,改写和再创作较为丰富。第二,贴合“君王镜鉴”的功能。以《神秘的秘密》为例,相较于西班牙对医学、养生法的关注,法国和意大利对神学、教育学的关注,《神秘的秘密》主要在英王和权贵的圈子里流传且与政治关系密切。《论政府原理》和《论君主政治》也呈现如此趋势。第三,12-15世纪,从《论政府原理》成书至中世纪晚期,转译和再创作的“君王镜鉴”在英国持续涌现。基于此,考察三大母本中明君理念在中世纪中后期的演变,应从英国切入。

① 向使用者提供某一书籍独立、连续编号的“认证文本”用于出租,费用由大学设定、并在授权的书店中公布进入名录的书籍列表。租赁者可以同时租借并复制同一教材的不同部分,另外还可以选择自行抄写(省去图书制作过程中成本最高的环节)或雇人抄写,以低成本获得所需书籍。

② 1282年,戈奇将《论君主政治》译作法语,其后又于1288年被翻译成意大利语。学者查尔斯·比格斯指出,“《论君主政治》的拉丁文本在1300年前流传,这之后主要是各地方言版本的传播”^[12](P13-19)。

③ 在16世纪30年代解散修道院之前,中世纪英格兰的本笃会、奥古斯丁会、方济会和吉尔伯特会等修道院/会均有《论君主政治》的抄本^[12](P93-102)。

三、明君理念在中世纪英国的接受与改写

除直接抄写之外，进献恩主的“君王镜鉴”往往因转译、增删、改写或再创作等缘故而出现不同程度的形变。依据与三大母本的关系，中世纪晚期英国的“君王镜鉴”可分为转译类、改写类与原创类。诸如上文述及的多种译本、匿名者《贤良君主须警惕的三点》、乔治·阿什比《哲学家言行录》等为转译类；威尔士的杰拉德《治者指南》、帕古拉的威廉《爱德华三世镜鉴》、约翰·索普《关于国王的四种形式》、托马斯·霍克利夫《君主的统治》等为改写类；乔治·阿什比《君王可行之策》、约翰·福蒂斯丘《英国法律颂》《英格兰的统治方式》等为原创类，三类“君王镜鉴”的独创性逐渐增强，三大母本中勾勒的明君也因此在英国被接受和改写。

这个过程体现为：系统地接受古典德性政治并融入基督教神学，酝酿出政治实践的向导。事实上，“君王镜鉴”三大母本已经萌生上述倾向，这在母本传播与改写的过程中得到强化，也进一步推动明君理念演变。

首先，明君与德性的联络呈现出先强化、后弱化的趋势。从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论政府原理》到罗马的吉尔斯《论君主政治》，以亚里士多德学说为中心的古典德性政治被系统地发掘和解读，德性与明君的联系得到强化，这表现为美德的地位被抬升且内容得到扩张。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主张“知识先于美德的培养”^[13](P15)，罗马的吉尔斯则认为“一个人如果拥有本书所讨论的智慧、意愿和其他道德美德，就有资格成为君主”^[17](P11)；同时，对美德的需求也从“适度”走向“理应具备所有”^[17](P104)。其逻辑是将美德视作良好、稳定王国政权的根基^[10](P22-23)。

然而，美德与明君的高度关联在14、15世纪开始弱化，其构成也逐渐固化至四枢德，美德与王政的关系得到再梳理。1410-1411年间，托马斯·霍克利夫在《君主的统治》中向威尔士亲王进谏，给予审慎特别关注。他写道，“审慎、节制、强力和正直，这是四枢德；审慎居于首位，将光辉给予忠告，指明其他三种美德的功用，他们依据忠告而行、事无巨细，若缺失审慎，没有人能够行善”^[7](P171)。虽然霍克利夫也谈及正义、怜悯、仁慈和耐心等美德，但未将它们与四枢德相提并论^[7](P80-100, 108-140)。1422年，詹姆斯·杨格在《王子的治理》中论及的四枢德略微不同，他强调“这并不在（伪）亚里士多德的书中，而是源自其他优秀的拉丁作品”^[26](P145-146)。杨格认为，《圣经》中倡导的虔信、希望和爱，既是救赎的前提，也是四枢德的基础；由审慎、正义、刚毅和节制构成的四枢德，通过上帝的指引、过往的历史已然展现这些美德之于君主的意义^[26](P146-192)。1461年，在献给兰开斯特爱德华王子的《君王的可行之策》和《哲学家言行录》中，乔治·阿什比依然注重君王的美德，并建议君王要明智、仁慈、虔诚和温和^[5](P12-41)。不同之处在于，他将美德与国王的声誉结合起来，即美德的重要性不在于美德本身，而在于它对国王声誉的影响；君王秉持美德的目标不是维系公共利益，而是自身的声誉和地位^[11](P278-286)。此外，他还区分国王的理论形象与治理实践，即理想君主并不意味着政治安宁，国王理想的形象无法决定他的政治实践。

其次，明君与基督教的联系逐渐强化并固定下来。在三大母本传抄初期，阿拉伯世界的秘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等非基督教学说充斥其中，“异教明君”影响甚广。“君王镜鉴”译作者通过删减和再创作，以基督教明君取而代之。一方面，占星学、相面学和亚里士多德的部分学说等与基督教主张相悖的内容，在罗马教廷的影响下传播受阻^①。1210-1277年间，数任教皇谴责“巴黎的一些文学院和神学院的学者宣传异端学说”，并在1212年、1231年、1272年和1277年的禁令中规定“亚里士多德关于科学、自然哲学的著作及其评注不得在巴黎公开或秘密阅读，违者将被开除教籍”，尤其在1277年禁令中列举202条与《圣经》相对立的观点^[27](P42-49)。受此影响，《神秘的秘密》《论君主政治》中“无法为《圣经》智慧服务

^① 神圣罗马帝国的宫廷是推动《神秘的秘密》在欧洲传播的另一个中心，皇帝腓特烈二世不仅延揽人才，而且热衷于同学者们讨论试图调和亚里士多德主义和犹太神学的《迷途之道》^[14](P112-114)。

的”部分在传抄过程中被删减^[27](P42)。另一方面,以“描摹上帝”为核心的基督教明君理念逐渐取代异教明君。基督教赋予王权神圣性并令世俗国王成为牧者的同时,使他们成为“上帝的仆人”;《申命记》则给予基督君主更明确的诫命,神命之君不应令百姓再回埃及,不可多立妃嫔,不可多积金银,应敬畏神,抄录律法书并谨守遵行。同时,如大卫王、所罗门王和约伯等《圣经》中的重要人物,也成为明君的重要参照。

由此,世俗权力源于上帝,敬畏上帝和尊崇律法的理念在诸多“君王镜鉴”中成为明君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13](P35-48)。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指出,统治者的幸运并非运气或偶然,而是上帝的爱和国王的美德共同作用之产物。基督信仰和德性学说调和在14、15世纪英国的“君王镜鉴”中得到继承发扬。1411年,托马斯·霍克利夫《君主的统治》“注释的三分之一来自武加大圣经,涵盖《创世纪》《保罗书信》《箴言》以及和所罗门王相关的内容”^[28](P12)。1438年,约翰·利德盖特在《王子的陨落》中强调,属灵权威使世俗权力合法化、制度化,“君主权应以‘温和’的方式得到适当约束”^[29](P95-152)。匿名者《献给国王亨利六世的统治之道》“以无与伦比的程度利用基督材料来描绘一位虔诚的、圣洁的、超凡脱俗的君王”^[11](P41)。

最后,助推明君的实用主义教导得到强化。诚然,“君王镜鉴”母本中不乏针对君主的教导,例如,的黎波里的菲利普所译《神秘的秘密》有相当的篇幅是针对君王的建议^[15](P28)。然而,这多集中在德性、声誉、衣着、举止等个人方面,缺乏政治实践性和针对性。该现象在母本方言化和原创性作品涌现后得到改善,中世纪后期英格兰“君王镜鉴”愈发直接地提出针对性的政治建议。1332年,帕古拉的威廉在《爱德华三世镜鉴》中为民众发声,要求国王有节制地使用采买权,“像普通人一样购买食物、饮料和其他必需品”,尊重买卖自由;“如果想要为自己和子孙保住王国,须得到民众的爱戴,欲以低于卖主预期价格夺取他人物品,将永远得不到民众的拥护”^[25](P51-69)。1475年,威廉·伍斯特在《贵族之书》中提出诸多颇为实用的劝导。他指出应向士兵提供合理的薪资,“士兵不得不掠夺、压迫当地民众,这种情形在英格兰的大陆领地陷落前十余年未曾得到遏制”^[21](P71-73)。同时,权贵子嗣应强化自古以来的骑士精神,接受军事训练以保卫领地。也就是“君王、贵族、骑士等拥有贵族血统的子嗣们,在他们年幼之时,就应该接受军事训练、教导和实践;包括马上长枪比武、持矛奔跑,使用斧头、刀剑、匕首和其他防御武器,参加摔跤、劈砍、跳跃和奔跑等练习,使他们变得坚韧、敏捷、呼吸顺畅……这是法国和英格兰国王的古老习惯,尤其为爱德华三世、兰开斯特公爵亨利秉持”^[21](P76)。此外,“应当避免在服饰昂贵和浮华”,因为在法国“已经明令禁止所有昂贵的服装、袍子、配饰和毛皮……而在英格兰,昂贵的服装和各式各样的配饰导致这片土地贫穷,激起人们的傲慢、妒忌和愤怒”^[21](P79)。

由此可见,伴随着“君王镜鉴”母本的方言化以及原创文本在中世纪晚期英国的持续涌现,“君王镜鉴”母本中的明君理念被接受与改写。总体上,基督教君主元素和政治实践教导的内容被添加和强化,德性的内容则被弱化。

四、明君理念演变逻辑与实践落差

从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论政府原理》到约翰·福蒂斯丘《英格兰的统治方式》,中世纪英国“君王镜鉴”中的明君形象由践行中庸之道的德性君主演变为熟稔英法政制的强力之君。一度被奉若圭臬的德性君主,被务实君主所取代。这一转变以特拉维萨的约翰译介《论君主政治》为节点。在此之前,流传在英国的“君王镜鉴”致力追寻德性君主,直至系统吸收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的《论君主政治》英译本诞生,德性君主理念达至巅峰;在此之后,现实政治的异动暴露出德性明君与实践的巨大落差,利德盖特、阿什比和福蒂斯丘等人的“君王镜鉴”愈发关切现实,转而支持强力的务实君主。事实上,德性与务实并不对立,其转变的核心在于突破德性的枷锁,由美德主导化为现实主导。这是中世纪晚期英国政治动荡、王朝鼎革的直接产物,明君理念和“君王镜鉴”进一步作用并形塑现实政治。

倡导德性明君理念，符合基督教修士的诉求及学术发展的脉络，是有机体理论的自然延伸；然而，这既不切合中世纪晚期英国的政治实际，也没法为恩主提供行之有效的统治策略，“君王镜鉴”的书写逻辑发生转变，明君理念自然改变。这可以通过这一时期英国的“君王镜鉴”加以诠释。

中世纪晚期英国“君王镜鉴”作家塑造多样明君，德性与务实此消彼长。霍克利夫、利德盖特的笔下，美德仍然为明君不可或缺。在1411年成书的《君主的统治》中，霍克利夫多次强调亨利王子先祖的德性。他宣称兰开斯特公爵约翰是“最擅长自我管理的领主”“配得上所有骑士的美德”；并以先祖的德性规劝王子，“优秀的王子啊，请注意您的祖父，他是如何慈悲为怀的，出于仁慈，放弃应得的报酬，他的一生从未复仇，总宽恕有罪、过错之人，我们的主人，您的父亲也是如此”^[7](P19, 121)。霍克利夫俨然已将德性视作兰开斯特王朝合法性的重要依据。利德盖特则通过负面警醒表明，德性是君主摆脱命运嘲弄的出口。在历数诸多王子陨落的事例后，他指出“并不是命运女神令君王们陨落，而是邪恶的生活……良善的生活和德性让他变得更为强壮，他也因此能够处于长久的繁盛之中；德性之于命运的意义非凡，（拥有德性）命运女神便无法全然主宰，君王们也因此理性的统治”^[6](P201)。

然而，在乔治·阿什比和约翰·福蒂斯丘的笔下，德性君主退却，务实君主崛起。阿什比在1463年成书的《君王的可行之策》和《哲学家言行录》中，呈现出两种相互竞争的王权观：一种是温柔仁慈的统治者，另一种是多疑、惩罚性强、采取务实行动的国王^[11]。阿什比不厌其烦地叙述仁慈、节制等美德，“你必须凭着正义，真理、良知和判断力去统治，要兼具怜悯与耐心，不要在命令中带着复仇，因为那属于全能的上帝，凡是没有恩典和怜悯的人，终必因故灭亡……”。他强调谨慎和智慧是最重要的美德，智慧弥合神学与政治间的鸿沟，带来世俗与天国双重优势，它们是其他美德的源泉^[5](P23, 66, 77, 86)。

他更直面并肯定猜疑、警惕、保密、惩罚等与德性格格不入的特质。其一，相较于“万事皆须顾问”，君主应有自主意志。“以忠告和良策治国固然好，然不应为忠告所支配，而是要向他们学习，并在每件事上亲力亲为”^[5](P69)。其二，君王不应轻信他人。“如果你想知道他人的本性，他的目的、意图和情形，与他协商要事，你就能马上知道他的意图，他的性情好恶，倾向于公平、还是虚假的不义”；那些轻视他人、贪婪、品行不端、太过富有、犯罪和对敌人有利的人，均不应信任^[5](P55, 68-69)。而且“对其他人的信任都是欺骗，极易被误导”^[5](P40)。其三，君王应直面并采用没有美德色彩的策略。阿什比建议国王保持警惕、保守秘密、严惩叛徒，尤其严肃地指出：“你必须使用一切手段，制服每一个不服管教、妄图篡权之人”^[5](P25-26)。福蒂斯丘的主张与之相近，他将明法善治之君视作明君。在《英国法律颂》中，福蒂斯丘劝诫兰开斯特的爱德华王子“沉醉于骑马、军事事务外，还要通晓律法”；在《英格兰的统治方式》中倡导“王国统治者，需要经营财政、羁勒权贵……”^[30](PXVIII)。可见，乔治·阿什比和约翰·福蒂斯丘代表的中世纪晚期“君王镜鉴”作家，已经将明君的焦点从德性转移至政治实践。

这种变化源于德性明君理念在政治实践中受挫。1327-1485年八任英王在位，五次通过非正常继承实现，尤以1455-1485年持续三十年的“玫瑰战争”期间最为混乱。其间，“君王镜鉴”在英国集中涌现，并出现诸如《神秘的秘密》《哲学家的言行录》等“君王镜鉴”的不同译本分别献给对立的兰开斯特和约克家族的现象，德性明君理念的实践效力急转直下^①。1399年，亨利·博林布鲁克推翻理查二世后，于同年9月30日召开议会谴责后者的暴政。在议会开幕的演讲中，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阿德伦尔宣称“英格兰王国近来长期由一名儿童统治和管理，并听从寡妇的建议；幸而全能的上帝通过其恩典和慈悲，一名明智、谨慎的人登上王位……他希望依照普遍的建议、忠告和同意进行统治”^[31](P415)，通过对比凸显新君的德性。同时，在对理查二世“邪恶统治”的指控中，多次提及理查二世“威胁、恐吓、诱导、强迫、欺骗、

① 1461年，乔治·阿什比将《哲学家的言行录》附在《君王的可行之策》后献给兰开斯特的爱德华王子，1477年，里沃斯伯爵将其译制的《哲学家言行录》献给约克的爱德华王子。此外，约翰·福蒂斯丘在追随亨利六世的妻子玛格丽特王后流亡法国时，为兰开斯特的爱德华王子献上《英国法律颂》，原意献给亨利六世的《英格兰的统治方式》，在无望后，献给昔日敌对的爱德华四世^[4](P297-308)。

残忍、失信”等不公正的行为,“彻底地违背加冕誓言所承诺公正、诚实、审慎、仁慈地施行权力”^[31](P417-420)。可见,即便是经历废黜合法君主并任由其毙命狱中,关注君王德性仍是政治实践的主流。因此,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依然会将《论君主政治》《君主的统治》等倡导德性的“君王镜鉴”随身携带、交由仆从于用餐时阅读、或打发睡前时光^[12](P1-2)^[28](P102)。

亨利六世在统治中先后呈现出来的“幼稚”“疯癫”和“虔诚”,以及“玫瑰战争”的家族对立令德性君主在政治实践和政治书写中接连失利。1444年,来自雷丁的乡绅托马斯·科弗尔因“叛国罪”而被公开游街、濒临绝境,这一切只源于他的一句戏谑。他在同约翰·拜内德交谈中引用拉丁语“欢迎来到男孩儿为王的国度”,热情地(恶意地)用英语重复这句话,并说高级廷臣禁止在国王和其他人面前背诵那段文字^[32](P331-332)。此时亨利六世已经成年并亲政七年之久,却难以摆脱“幼稚”的形象。1453年8月10日,亨利六世在收到卡斯蒂永战败、什鲁斯伯里伯爵约翰·塔伯特父子战死的消息后,陷入一种“疯癫”状态,对周围环境一无所知、对身边的人和事物没有任何反应,甚至无法移动……必须接受喂养,在两名仆人的帮助下移动身体。饱受“幼稚”“疯癫”诟病的亨利六世,却“终其一生在践行圣洁的美德”,“甚至如同第二个约伯一般单纯正直、敬畏神”^[33](P25-33)。如此一名近乎完美契合德性话语的君主两度沦为阶下囚,将英格兰推入内战之中,这引发乔治·阿什比、约翰·福蒂斯丘等“君王镜鉴”作者的反思。在分别向兰开斯特、约克家族的爱德华王子进献的“君王镜鉴”中,对立阵营的作者均削弱关于德性的话语,走向务实。

归根结底,伴随着君主定位的变迁,“君王镜鉴”作者塑造的明君形象随之转变。法国学者米歇尔·塞内拉特认为,中世纪西欧君主经历从通过提倡美德和虔诚来纠正自己和民众行为的训导者,到对日益集权的王国进行施行统治艺术的统治者,最后到保护自己权威地位的计算器^[34](P65-278)。中世纪英国的王政一定程度上与之契合,当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与基督神命之君共同塑造的继承传统在15世纪被破坏后,英王面临的政治现实愈发严峻。作为与现实政治高度相关的资政、劝诫书写,自然走向务实。中世纪晚期英国高层政治震荡与“君王镜鉴”书写变迁,折射出道德与政治之间恒久的冲突与张力。以朴素的道德德性为旨归、强调德性和美德对于明君功用的德性话语遭遇挑战,渐趋式微;德性从其作为统治核心目的的地位,转变为服务于实用政治目标的辅助性工具,以功利、现实、实用主义为宗旨的务实话语崛起,这是中世纪晚期英国政治书写和思想领域最显著的变动。

五、结 语

本文以“君王镜鉴”中的明君理念为主线,对母本中的三类明君予以廓清,在此基础上梳理“君王镜鉴”母本在12-15世纪英国的传抄、译、改写与再创作,表明德性明君理念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接受与改写,终在现实政治的冲击下,务实取向逐渐取而代之。中世纪早期以来,“君王镜鉴”作家汲取《圣经》和古典作家言说的明君形象——即贤能君主均充满德性,将德性同明君相附并总结归纳一些善政的实践体现,把君王秉性、装束和言行举止视作判断君主贤能与否的参考条件。这导致在“君王镜鉴”的书写中,德性成为君主追寻的终极目的,统治基于德性展开。然而,这是理论和实践的错位。

成功的、具有影响力的君主往往确实在文本中呈现出德性的形象,但德性尤其是朴素的道德德行和基督教君王四枢德并不决定君主统治成功与否,甚至无法保障君主的统治。其逻辑是,是成功的统治令特定君主在文本中充满德性,而不是丰盈的德性带来君主的成功治理。从实践的角度上来看,对内统治有力、维持王国正常运作,对外维护或者扩张本国利益的君主,往往能够依仗自己的统治能力和战功,赢得正面的、甚至德性的明君形象;然而,单纯凭借个人道德德性,或仅拥有德性而不能妥当履行统治核心义务的君主,势必无法取得正面的评价。亨利六世统治失败将“君王镜鉴”单一德性训诫的书写传统解构。例如,福蒂斯丘在教育储君的《英国法律颂》之中,勉励王子研习律法,尤其是英格兰普通法;而在向

爱德华四世进献的《英格兰的统治方式》中，则直指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弊政，献策重振王室财政、羁勒权贵和改革行政，程式化的道德训诫被具体可行的举措取代。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德性的彻底隐退，德性成为服务于统治的、可以进行取舍的工具。

本质上，“君王镜鉴”中明君理念的变迁，是以君主为核心的中世纪政治思想对古典道德德性政治思想的吸收、交融的集中表达。由此，对道德德性的过度强调被弱化，政治思想的演进再次回到政治实践主导的路径之上。

参考文献

- [1] Jean-Philippe Genet. *Four English Political Tracts of the Late Middle Ages*. 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Press, 1977.
- [2] Noëlle-Laetitia Perret, Stéphane Péquignot. *A Critical Companion to the "Mirror for Princes" Literature*. Leiden: The Brill Press, 2022.
- [3] Lester Kruger Born. The Perfect Princes: A Study in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y Ideals. *Speculum*, 1928, 3(4).
- [4] 朱文旭. 隐喻：15世纪英国“君王镜鉴”的政治表达. 西南大学学报, 2024, (6).
- [5] M. Bateson. *George Ashby's Poe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99.
- [6] Henry Bergen. *Lydgate's Fall of Princes (Vol. I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4.
- [7] F. J. Furnivall. *Hoccleve's Works: The Regiment of Princes and Fourteen Minor Poe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97.
- [8] Carol M. Meale. The Middle English Romance of Ipomedon: A Late Medieval "Mirror" for Princes and Merchants. *Reading Medieval Studies*, 1984, (10).
- [9] Geert Roskam, Stefan Schorn. *Concepts of Ideal Rulership from Antiquity to the Renaissance*. Turnhout: Brepols Publishers, 2018.
- [10] John Watts. *Henry VI and the Politics of Kingship*.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11] Aline Anna Douma. *George Ashby's Active Policy of a Prince, Lancastrian Kingship and Political Advice in the Wars of the Roses*. Groningen: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2023.
- [12] Charles F. Briggs. *Giles of Roma's De Regimine Principum, Reading and Writing Politics at Court and University, c. 1275-c. 152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3] Cary J. Nederman. *Policraticus: Of the Frivolities of Courtiers and the Footprints of Philosoph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14] Steven James Williams. *The Secret of Secrets, The Scholarly Career of a Pseudo-Aristotelian Text in the Latin Middle Age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
- [15] Robert Steele. *Secretum Secretorum Cum Glossis et Notul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0.
- [16] M. A. Manzalaoui. *Secretum Secretorum: Nine English Vers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17] David C. Fowler, Charles F. Briggs, Paul G. Remley. *The Governance of Kings and Princes, John Trevisa's Middl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De Regimine Principum of Aegidius Romanus*. London: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4.
- [18] Frédérique Lanchaud. Filiation and Context: The Medieval Afterlife of the *Policraticus*//Christophe Grellard. Frédérique Lanchaud. *A Companion to John of Salisbury*. London: The Brill Press, 2014.
- [19] Robert Bartlett. *Instruction for a Ruler (De Principis Instructio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 [20] Jenny Swanson. *John of Wales, A Study of the Works and Ideas of a Thirteenth-century Fri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21] John Gough Nicholes. *The Book of Noblesse*. New York: Burt Franklin, 1972.
- [22] E. L. Saak. The Limits of Knowledge: Hélinand de Froidmot's *Chronicon*//Peter Binkley. *Pre-Modern Encyclopaedic Text*. Leiden: The Brill Press, 1997.
- [23] A. de Poorter. *Le Traité Eruditio Regum et Principum de Guibert de Tournai*. Louvain: Institut Supérieur de Philosophie de L' Université, 1914.
- [24] Henricus Denifle. *Chartularium Universitatis Parisiensis (Tomus II)*. Paris: Ex Typis Fratrum Delalain, 1891.

- [25] Cary J. Nederman. The Monarch and Marketplace: Economic Policy and Royal Finance in William of Pagula's *Speculum regis Edwardi III*.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1, 33(1).
- [26] Robert Steele. *Three Prose Versions of the Secreta Secretu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98.
- [27] Edward Grant. *A Source Book in Medieval Scie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28] Charles R. Blyth. *The Regiment of Princes*. Kalamazoo: 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1999.
- [29] Nigel Mortimer. *John Lydgate's Fall of Princes: Narrative Tragedy in Its Literary and Political Contexts*.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2005.
- [30] S. B. Chirnes. *De Laudibus Legum Angli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31] Chris Given-Wilson, Paul Brand, Seymour Philips. *The Parliament Rolls of Medieval England (Vol. III)*.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05.
- [32] C. A. F. Meekings. Thomas Kerver's Case, 1444.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975, 90(2).
- [33] M. R. James. *Henry the Sixth, A Reprint of John Blacman's Memoi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9.
- [34] Michel Senellart. *Les Arts de Gouverner; Du Regimen Médiéval au Concept du Gouvernement*.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2016.

On the Ideal Ruler in "Specula Principum" of Medieval England: Discourse, Evolution and Practice

Zhu Wenxu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In medieval Europe, where monarchical rule prevailed, the concep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ideal monarch, as exemplified by the "specula principum", evolved continuously over time. Three archetypes of this genre shaped as many models of the ideal monarch in the 12th and 13th centuries, based on different versions of Aristotle's *Politics*. After the 13th century, these three archetypes of "specula principum" were translated and rewritten across various We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and the three models of ideal rulers spread accordingly. The evolution of the "specula principum" in medieval England was both clear and diverse, as English writers systematically adopted and reworked the concept of the ideal ruler. Amid drastic political upheavals of the late Middle Ages, English authors of this genre steered the ideal kingship away from a moral virtues centered model towards one grounded in political pragmatism. This shift stemmed from the intertwined development and practical refinement of political thought and statecraft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 and marked an important stage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political ideas embodied in the "specula principum" tradition across the medieval era.

Key words "specula principum"; ideal kingship; monarchy types; the late Middle Ages

■ 作者简介 朱文旭,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博士后、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871。

■ 责任编辑 桂 莉